



刘劭画像

刘劭，字孔才，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广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人，生于东汉建宁年间，卒于曹魏正始年间。汉献帝时入仕，初为广平吏，后历任官太子舍人、秘书郎等；曹魏建立后，先后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等职，后授爵关内侯，死后追赠光禄勋。作为三国时期的经学家与律学家，刘劭学问渊博，著述颇丰，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有人才评鉴专著《人物志》，另有《都官考课》等部分散篇以及《新律》篇目存世，其人才选拔、官吏考课、法制建设等思想，均清晰体现在这些著述中。

### 重视人才选拔,明确君臣之道

刘劭生活于汉末三国时期,当时的东汉王朝已土崩瓦解,地方实力派纷纷割据称王。曹操在提倡法治的同时,继承了两汉以来独尊儒术的传统,推行“唯才是举”的选官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刘劭一方面对曹操的选才策略予以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任智力,讲兼并”的结果必然是奸诈纷起,民失依存。为此,他主张以德为主、德、法、术兼备的治国理念。其在《人物志》中倡导的基本思想就是推行明君贤臣政治,即通过明确君、臣的资质差别,践行“圣人兴德”“量能授官”的原则,最终实现“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的社会理想,从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标。

基于这一思想,刘劭在《人物志》中系统阐述了对人才的基本看法,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厘清各类人才的区别,明确“众材”与“能君众材”的差异,即“人君”之材与“人臣”之材的区别;其二,阐释“人君”之材与“人臣”之材的协调关系——明君臣之分,使各类人才都能够恪尽职守,乐为君主所用;助力圣贤君主知人善任,使“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最终实现垂拱而治。总之,就是由圣贤君主选贤与能,做到人尽其用、事得其人,无为而无不

为。刘劭的人才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东汉中期之后兴起的人物评鉴之风的一种总结和升华。东汉中期以后,朝政被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这种局面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的觉醒,人物品评之风随之盛行。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埴直之风,于斯行矣。”所谓“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正是士人相互品评的生动写照。

士人相互品评之风盛行,推动了乡间品评制度的发展与成熟。所谓乡间,是先秦以来的一种以民间组织形式推行教化礼仪的载体,即《周礼》所载“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州为乡,使之相宾”。汉末政治格局的变化,使乡间逐渐成为地方名士品评人物的核心场域,其品评结果直接影响州郡察举孝廉的人选。据《后汉书》记载,郭泰曾察识张孝仲、范特祖等六十余人,由此声名远扬,许劭所察也大致如此。刘劭与郭泰、许劭生活的年代非常接近,从《人物志》的内容来看,其思想与郭泰、许劭等名士察人的实践活动相契合,可见《人物志》对乡间品评活动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总结与升华。

### 强调官吏考课,主持制定《新律》

考课,也称考绩,是对官吏政绩的考评,也是我国古代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考课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至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曹魏明帝时期,论及考课者,除刘劭之外,还有傅嘏、杜恕、崔林与卢毓四人,但与刘劭注重制度不同,其他人虽承认制度的必要性,但又认为不能完全依赖制度,体现了儒家的人治思想。

据《三国志·魏书·刘劭传》记载: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顿,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蒙,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从这份上疏可以看出,刘劭认为官吏考课对实现政治清明非常重要,但制定和完善这一制度却长期被忽视,所以常出现鱼目混珠、贤愚不分的情况。刘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的核心目的,就是建立一套明确的考核标准,辨别官吏的履职能力。遗憾的是,由于群臣对这套制度褒贬不一,恰逢魏明帝驾崩,《都官考课》最终未能推行实施。

刘劭不但重视制度建设,还积极投身曹魏法制建设事业,除奉诏主持制定《新律》外,还撰有《律略论》和《法论》等,可惜后两部著作均已亡佚,仅在《隋书·经籍志》中留有著录;《新律》十八篇也未能完整传世,其内容散见于后世各类著述中。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从现存史料中梳理出刘劭法律思想的核心脉络。

自战国李悝制《法经》六篇(盗、贼、囚、捕、杂、具)之后,商鞅在秦国改法为律,西汉萧何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兴、厩”三篇,形成《九章律》,此后四百年没有大的变化。但《九章律》存在明显的缺陷,如作为刑法总则的《具律》既不在首,又不在尾,体例编排混乱。因此,曹魏政权稳定后,制定新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时魏明帝曹叡令刘劭等人主持制定《新律》。从现存史料来看,《新律》的内容比《九章律》更丰富,体例更加科学,结构也非常严谨,对之后《晋律》等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九章律》相比,其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扩充篇目条文,优化内容结构,克服了旧律“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缺陷,并注意对篇目与律文的归纳和调整,使法典内容既全面完备又简明扼要。二是规范法典体例,确立总则地位。首次突破李悝《法经》和秦汉以来的立法范式,将原第六篇《具律》改为《刑名》,并冠于律首,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这一修改为后世立法创造了新的基本体例构架,为后世《晋律》《唐律疏议》等法典所沿用。三是改革刑罚制度,推动法制文明。明确“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率先提出与旧五刑不同的新五刑概念,同时废除汉代法律中残酷的宫刑与斩右趾刑,缩小族刑的连坐范围,不诛及祖父母或孙辈,这些改革极大促进了刑罚制度的文明与进步。四是“八议”入律,深化礼法融合。将《周礼》中的“八辟”原则修订为“八议”制度,正式写入律条。“八议”具体指议亲、议故、议贵、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谏,这一制度的入律,既维护了封建等级特权,也开辟了礼法深度融合的新局面。

总之,《新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了刘劭等编纂者深厚的法律学识,更彰显了他们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为后世封建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宽猛相济”:让法律既存威严亦有温度

韩涛

的极致表达。“猛”确保法律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权威,避免法律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混乱。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宽”代表礼治的教化、体恤与包容,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尊重;“猛”则象征法治的威严、规范与强制,基于对社会秩序的必须维护。中国古代的“春秋决狱”“赦宥”等制度都是“宽”对“猛”的补充与修正,旨在实现“法内求情”,以达至具体的、个案的正义。

“宽猛相济”的哲学智慧在于其未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其核心在于平衡“礼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要求在制定和执行实证法时,接受自然法精神(仁、义)的指引和校准;同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必须以有效的法律秩序为基础和框架。二者在张力中相统一,实现“政是以和”的最高治理境界。

从法理学视角看,“宽猛相济”深刻揭示了规则与裁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猛”强调法律法规必须清晰、公开且具有强大约束力,要求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即“依法而治”。然而,法律规则具有一定抽象性、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此时“宽”作为裁量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宽”允许执法者和司法者在规则之内,基于情理、良知和具体情境作出合理决定。

回望历史长河,各朝各代的兴衰更替,都与统治者能否准确把握宽猛

平衡息息相关。秦朝奉行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徭役沉重,“猛”政达到极致,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为“宽”政,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至汉武帝时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税赋加重,法治严苛,又偏向“猛”政,虽成就赫赫之功,却也导致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

唐代的贞观之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太宗李世民对宽猛平衡的精准把握。他一方面完善法律制度,制定《贞观律》,使国家治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强调慎刑恤罚,多次亲自复查死刑案件,避免冤滥。他曾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既重视法律权威,又关注个体命运,正是“宽猛相济”治理理念的生动体现。

明初朱元璋实行重典治国,对贪官污吏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其政不可谓不“猛”。然而,过于严酷的刑罚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贪污和吏治问题,反而导致官员人人自危,行政效率低下。至明朝中后期,法制逐渐松弛,社会控制减弱,又偏于“宽”政,结果政治腐败加剧,社会矛盾积累,最终导致明朝灭亡。这一历史循环再次证明,偏离宽猛平衡的治理,无论偏向哪一端,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当代国家治理中,“宽猛相济”的智慧依然具有深刻意义。它提示我们,社会治理既要有法治的刚性约束,

杀之,假手凶徒,使太阿旁落之理!”《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则南宋淳熙年间的司法轶事:荆门发生冤案,地方官为规避失察之责,没有奏报朝廷,而是在监狱里私自处死犯人。不久,当地太守、签判相继而亡,时人皆认为“或谓不明正典刑之故。”这一记载也印证了当时的普遍观念,即司法官未能将犯人明正典刑,无异于渎职。

在程序层面,“明正典刑”的核心要求是惩办犯人须遵循法定程序,尤其要公开执行刑罚,这正是“明正典刑”中“明”的精髓所在。古人坚信,只有公开执行刑罚,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化功能,同时修复被破坏的正义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周礼》中“使万民观刑象”的记载,便是这一理念的早期实践;后世的梟首、弃市等刑罚,以及枷号、游街示众等做法也延续了这一理念。“弃市”的本义为“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在公开行刑的过程中融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于一体,实现惩一戒百的社会效果。北宋末年,李光弼劾奸臣朱勔时,便请求朝廷将其“明正典刑,戮之市曹。”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也有“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的对白。可见,对行刑场所和形式的要求实为“明正典刑”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古人推崇明正典刑,背后蕴含着

赏令”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简文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其一,明确招降核心对象。任何一位普通的匈奴将士都能揭下这份招降文书吗?有学者认为,这份赏令仅针对匈奴的大小贵族和军事将领,具体包括三类人:率领八千人以上部众归降的匈奴大贵族、立有军功的匈奴君长级大贵族以及能够统率千骑至五百骑以上部众的匈奴军事将领。这种分层定位,体现了汉朝“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路,旨在通过拉拢核心领导层,瓦解匈奴的军事与政治体系。

其二,推行“因俗而治”的安定策略。赏令明确规定,立有军功的匈奴大贵族归降后,可保留原有君长地位,继续统率本部部众,且其部众还将被赋予平民身份。这一政策契合匈奴政治和军事合一的体制特点,既发挥了匈奴首领的组织协调作用,又为归降部众融入汉朝社会奠定基础。

其三,设定阶梯式的降附收益。汉朝不仅依据归降的匈奴贵族所立的军功授予爵位,还赐予黄金(五十斤乃至五百斤)、相应规模的食邑。简文中提及的“少上造”和“列侯”两种爵位,分别对应汉朝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五级爵位和第二十级(最高级)爵位。尽管学界对有关爵制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存在争议,但足可以看出,汉朝为拱卫丝绸之路“咽喉”地带、分化瓦解匈奴,不惜“下血本”推行招降策略的决心。

《击匈奴降者赏令》绝非单纯的军事律令文书,更蕴含着规劝、整合、声讨、威慑匈奴贵族和将领的多重政治意涵,为我们了解汉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关键视角。

首先,赏令具有彰显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根本作用。有研究认为,汉初匈



## “宽猛相济”:让法律既存威严亦有温度

韩涛

的极致表达。“猛”确保法律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权威,避免法律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混乱。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宽”代表礼治的教化、体恤与包容,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尊重;“猛”则象征法治的威严、规范与强制,基于对社会秩序的必须维护。中国古代的“春秋决狱”“赦宥”等制度都是“宽”对“猛”的补充与修正,旨在实现“法内求情”,以达至具体的、个案的正义。

“宽猛相济”的哲学智慧在于其未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其核心在于平衡“礼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要求在制定和执行实证法时,接受自然法精神(仁、义)的指引和校准;同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必须以有效的法律秩序为基础和框架。二者在张力中相统一,实现“政是以和”的最高治理境界。

从法理学视角看,“宽猛相济”深刻揭示了规则与裁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猛”强调法律法规必须清晰、公开且具有强大约束力,要求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即“依法而治”。然而,法律规则具有一定抽象性、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此时“宽”作为裁量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宽”允许执法者和司法者在规则之内,基于情理、良知和具体情境作出合理决定。

回望历史长河,各朝各代的兴衰更替,都与统治者能否准确把握宽猛

杀之,假手凶徒,使太阿旁落之理!”《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则南宋淳熙年间的司法轶事:荆门发生冤案,地方官为规避失察之责,没有奏报朝廷,而是在监狱里私自处死犯人。不久,当地太守、签判相继而亡,时人皆认为“或谓不明正典刑之故。”这一记载也印证了当时的普遍观念,即司法官未能将犯人明正典刑,无异于渎职。

在程序层面,“明正典刑”的核心要求是惩办犯人须遵循法定程序,尤其要公开执行刑罚,这正是“明正典刑”中“明”的精髓所在。古人坚信,只有公开执行刑罚,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化功能,同时修复被破坏的正义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周礼》中“使万民观刑象”的记载,便是这一理念的早期实践;后世的梟首、弃市等刑罚,以及枷号、游街示众等做法也延续了这一理念。“弃市”的本义为“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在公开行刑的过程中融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于一体,实现惩一戒百的社会效果。北宋末年,李光弼劾奸臣朱勔时,便请求朝廷将其“明正典刑,戮之市曹。”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也有“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的对白。可见,对行刑场所和形式的要求实为“明正典刑”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古人推崇明正典刑,背后蕴含着

赏令”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简文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其一,明确招降核心对象。任何一位普通的匈奴将士都能揭下这份招降文书吗?有学者认为,这份赏令仅针对匈奴的大小贵族和军事将领,具体包括三类人:率领八千人以上部众归降的匈奴大贵族、立有军功的匈奴君长级大贵族以及能够统率千骑至五百骑以上部众的匈奴军事将领。这种分层定位,体现了汉朝“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路,旨在通过拉拢核心领导层,瓦解匈奴的军事与政治体系。

其二,推行“因俗而治”的安定策略。赏令明确规定,立有军功的匈奴大贵族归降后,可保留原有君长地位,继续统率本部部众,且其部众还将被赋予平民身份。这一政策契合匈奴政治和军事合一的体制特点,既发挥了匈奴首领的组织协调作用,又为归降部众融入汉朝社会奠定基础。

其三,设定阶梯式的降附收益。汉朝不仅依据归降的匈奴贵族所立的军功授予爵位,还赐予黄金(五十斤乃至五百斤)、相应规模的食邑。简文中提及的“少上造”和“列侯”两种爵位,分别对应汉朝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五级爵位和第二十级(最高级)爵位。尽管学界对有关爵制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存在争议,但足可以看出,汉朝为拱卫丝绸之路“咽喉”地带、分化瓦解匈奴,不惜“下血本”推行招降策略的决心。

《击匈奴降者赏令》绝非单纯的军事律令文书,更蕴含着规劝、整合、声讨、威慑匈奴贵族和将领的多重政治意涵,为我们了解汉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关键视角。

首先,赏令具有彰显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根本作用。有研究认为,汉初匈



## “宽猛相济”:让法律既存威严亦有温度

韩涛

的极致表达。“猛”确保法律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权威,避免法律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混乱。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宽”代表礼治的教化、体恤与包容,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尊重;“猛”则象征法治的威严、规范与强制,基于对社会秩序的必须维护。中国古代的“春秋决狱”“赦宥”等制度都是“宽”对“猛”的补充与修正,旨在实现“法内求情”,以达至具体的、个案的正义。

“宽猛相济”的哲学智慧在于其未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其核心在于平衡“礼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要求在制定和执行实证法时,接受自然法精神(仁、义)的指引和校准;同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必须以有效的法律秩序为基础和框架。二者在张力中相统一,实现“政是以和”的最高治理境界。

从法理学视角看,“宽猛相济”深刻揭示了规则与裁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猛”强调法律法规必须清晰、公开且具有强大约束力,要求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即“依法而治”。然而,法律规则具有一定抽象性、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此时“宽”作为裁量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宽”允许执法者和司法者在规则之内,基于情理、良知和具体情境作出合理决定。

回望历史长河,各朝各代的兴衰更替,都与统治者能否准确把握宽猛

杀之,假手凶徒,使太阿旁落之理!”《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则南宋淳熙年间的司法轶事:荆门发生冤案,地方官为规避失察之责,没有奏报朝廷,而是在监狱里私自处死犯人。不久,当地太守、签判相继而亡,时人皆认为“或谓不明正典刑之故。”这一记载也印证了当时的普遍观念,即司法官未能将犯人明正典刑,无异于渎职。

在程序层面,“明正典刑”的核心要求是惩办犯人须遵循法定程序,尤其要公开执行刑罚,这正是“明正典刑”中“明”的精髓所在。古人坚信,只有公开执行刑罚,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化功能,同时修复被破坏的正义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周礼》中“使万民观刑象”的记载,便是这一理念的早期实践;后世的梟首、弃市等刑罚,以及枷号、游街示众等做法也延续了这一理念。“弃市”的本义为“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在公开行刑的过程中融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于一体,实现惩一戒百的社会效果。北宋末年,李光弼劾奸臣朱勔时,便请求朝廷将其“明正典刑,戮之市曹。”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也有“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的对白。可见,对行刑场所和形式的要求实为“明正典刑”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古人推崇明正典刑,背后蕴含着

赏令”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简文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其一,明确招降核心对象。任何一位普通的匈奴将士都能揭下这份招降文书吗?有学者认为,这份赏令仅针对匈奴的大小贵族和军事将领,具体包括三类人:率领八千人以上部众归降的匈奴大贵族、立有军功的匈奴君长级大贵族以及能够统率千骑至五百骑以上部众的匈奴军事将领。这种分层定位,体现了汉朝“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路,旨在通过拉拢核心领导层,瓦解匈奴的军事与政治体系。

其二,推行“因俗而治”的安定策略。赏令明确规定,立有军功的匈奴大贵族归降后,可保留原有君长地位,继续统率本部部众,且其部众还将被赋予平民身份。这一政策契合匈奴政治和军事合一的体制特点,既发挥了匈奴首领的组织协调作用,又为归降部众融入汉朝社会奠定基础。

其三,设定阶梯式的降附收益。汉朝不仅依据归降的匈奴贵族所立的军功授予爵位,还赐予黄金(五十斤乃至五百斤)、相应规模的食邑。简文中提及的“少上造”和“列侯”两种爵位,分别对应汉朝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五级爵位和第二十级(最高级)爵位。尽管学界对有关爵制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存在争议,但足可以看出,汉朝为拱卫丝绸之路“咽喉”地带、分化瓦解匈奴,不惜“下血本”推行招降策略的决心。

《击匈奴降者赏令》绝非单纯的军事律令文书,更蕴含着规劝、整合、声讨、威慑匈奴贵族和将领的多重政治意涵,为我们了解汉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关键视角。

首先,赏令具有彰显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根本作用。有研究认为,汉初匈



## “宽猛相济”:让法律既存威严亦有温度

韩涛

的极致表达。“猛”确保法律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权威,避免法律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混乱。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宽”代表礼治的教化、体恤与包容,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尊重;“猛”则象征法治的威严、规范与强制,基于对社会秩序的必须维护。中国古代的“春秋决狱”“赦宥”等制度都是“宽”对“猛”的补充与修正,旨在实现“法内求情”,以达至具体的、个案的正义。

“宽猛相济”的哲学智慧在于其未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其核心在于平衡“礼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要求在制定和执行实证法时,接受自然法精神(仁、义)的指引和校准;同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必须以有效的法律秩序为基础和框架。二者在张力中相统一,实现“政是以和”的最高治理境界。

从法理学视角看,“宽猛相济”深刻揭示了规则与裁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猛”强调法律法规必须清晰、公开且具有强大约束力,要求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即“依法而治”。然而,法律规则具有一定抽象性、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此时“宽”作为裁量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宽”允许执法者和司法者在规则之内,基于情理、良知和具体情境作出合理决定。

回望历史长河,各朝各代的兴衰更替,都与统治者能否准确把握宽猛

杀之,假手凶徒,使太阿旁落之理!”《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则南宋淳熙年间的司法轶事:荆门发生冤案,地方官为规避失察之责,没有奏报朝廷,而是在监狱里私自处死犯人。不久,当地太守、签判相继而亡,时人皆认为“或谓不明正典刑之故。”这一记载也印证了当时的普遍观念,即司法官未能将犯人明正典刑,无异于渎职。

在程序层面,“明正典刑”的核心要求是惩办犯人须遵循法定程序,尤其要公开执行刑罚,这正是“明正典刑”中“明”的精髓所在。古人坚信,只有公开执行刑罚,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化功能,同时修复被破坏的正义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周礼》中“使万民观刑象”的记载,便是这一理念的早期实践;后世的梟首、弃市等刑罚,以及枷号、游街示众等做法也延续了这一理念。“弃市”的本义为“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在公开行刑的过程中融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于一体,实现惩一戒百的社会效果。北宋末年,李光弼劾奸臣朱勔时,便请求朝廷将其“明正典刑,戮之市曹。”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也有“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的对白。可见,对行刑场所和形式的要求实为“明正典刑”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古人推崇明正典刑,背后蕴含着

赏令”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简文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其一,明确招降核心对象。任何一位普通的匈奴将士都能揭下这份招降文书吗?有学者认为,这份赏令仅针对匈奴的大小贵族和军事将领,具体包括三类人:率领八千人以上部众归降的匈奴大贵族、立有军功的匈奴君长级大贵族以及能够统率千骑至五百骑以上部众的匈奴军事将领。这种分层定位,体现了汉朝“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路,旨在通过拉拢核心领导层,瓦解匈奴的军事与政治体系。

其二,推行“因俗而治”的安定策略。赏令明确规定,立有军功的匈奴大贵族归降后,可保留原有君长地位,继续统率本部部众,且其部众还将被赋予平民身份。这一政策契合匈奴政治和军事合一的体制特点,既发挥了匈奴首领的组织协调作用,又为归降部众融入汉朝社会奠定基础。

其三,设定阶梯式的降附收益。汉朝不仅依据归降的匈奴贵族所立的军功授予爵位,还赐予黄金(五十斤乃至五百斤)、相应规模的食邑。简文中提及的“少上造”和“列侯”两种爵位,分别对应汉朝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五级爵位和第二十级(最高级)爵位。尽管学界对有关爵制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存在争议,但足可以看出,汉朝为拱卫丝绸之路“咽喉”地带、分化瓦解匈奴,不惜“下血本”推行招降策略的决心。

《击匈奴降者赏令》绝非单纯的军事律令文书,更蕴含着规劝、整合、声讨、威慑匈奴贵族和将领的多重政治意涵,为我们了解汉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关键视角。

首先,赏令具有彰显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根本作用。有研究认为,汉初匈



## “宽猛相济”:让法律既存威严亦有温度

韩涛

的极致表达。“猛”确保法律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权威,避免法律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混乱。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宽”代表礼治的教化、体恤与包容,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尊重;“猛”则象征法治的威严、规范与强制,基于对社会秩序的必须维护。中国古代的“春秋决狱”“赦宥”等制度都是“宽”对“猛”的补充与修正,旨在实现“法内求情”,以达至具体的、个案的正义。

“宽猛相济”的哲学智慧在于其未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其核心在于平衡“礼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要求在制定和执行实证法时,接受自然法精神(仁、义)的指引和校准;同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必须以有效的法律秩序为基础和框架。二者在张力中相统一,实现“政是以和”的最高治理境界。

从法理学视角看,“宽猛相济”深刻揭示了规则与裁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猛”强调法律法规必须清晰、公开且具有强大约束力,要求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即“依法而治”。然而,法律规则具有一定抽象性、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此时“宽”作为裁量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宽”允许执法者和司法者在规则之内,基于情理、良知和具体情境作出合理决定。

回望历史长河,各朝各代的兴衰更替,都与统治者能否准确把握宽猛

杀之,假手凶徒,使太阿旁落之理!”《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则南宋淳熙年间的司法轶事:荆门发生冤案,地方官为规避失察之责,没有奏报朝廷,而是在监狱里私自处死犯人。不久,当地太守、签判相继而亡,时人皆认为“或谓不明正典刑之故。”这一记载也印证了当时的普遍观念,即司法官未能将犯人明正典刑,无异于渎职。

在程序层面,“明正典刑”的核心要求是惩办犯人须遵循法定程序,尤其要公开执行刑罚,这正是“明正典刑”中“明”的精髓所在。古人坚信,只有公开执行刑罚,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化功能,同时修复被破坏的正义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周礼》中“使万民观刑象”的记载,便是这一理念的早期实践;后世的梟首、弃市等刑罚,以及枷号、游街示众等做法也延续了这一理念。“弃市”的本义为“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在公开行刑的过程中融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于一体,实现惩一戒百的社会效果。北宋末年,李光弼劾奸臣朱勔时,便请求朝廷将其“明正典刑,戮之市曹。”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也有“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的对白。可见,对行刑场所和形式的要求实为“明正典刑”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古人推崇明正典刑,背后蕴含着

赏令”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简文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其一,明确招降核心对象。任何一位普通的匈奴将士都能揭下这份招降文书吗?有学者认为,这份赏令仅针对匈奴的大小贵族和军事将领,具体包括三类人:率领八千人以上部众归降的匈奴大贵族、立有军功的匈奴君长级大贵族以及能够统率千骑至五百骑以上部众的匈奴军事将领。这种分层定位,体现了汉朝“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路,旨在通过拉拢核心领导层,瓦解匈奴的军事与政治体系。

其二,推行“因俗而治”的安定策略。赏令明确规定,立有军功的匈奴大贵族归降后,可保留原有君长地位,继续统率本部部众,且其部众还将被赋予平民身份。这一政策契合匈奴政治和军事合一的体制特点,既发挥了匈奴首领的组织协调作用,又为归降部众融入汉朝社会奠定基础。

其三,设定阶梯式的降附收益。汉朝不仅依据归降的匈奴贵族所立的军功授予爵位,还赐予黄金(五十斤乃至五百斤)、相应规模的食邑。简文中提及的“少上造”和“列侯”两种爵位,分别对应汉朝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五级爵位和第二十级(最高级)爵位。尽管学界对有关爵制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存在争议,但足可以看出,汉朝为拱卫丝绸之路“咽喉”地带、分化瓦解匈奴,不惜“下血本”推行招降策略的决心。

《击匈奴降者赏令》绝非单纯的军事律令文书,更蕴含着规劝、整合、声讨、威慑匈奴贵族和将领的多重政治意涵,为我们了解汉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关键视角。

首先,赏令具有彰显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根本作用。有研究认为,汉初匈



## “宽猛相济”:让法律既存威严亦有温度

韩涛

的极致表达。“猛”确保法律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权威,避免法律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混乱。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宽”代表礼治的教化、体恤与包容,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尊重;“猛”则象征法治的威严、规范与强制,基于对社会秩序的必须维护。中国古代的“春秋决狱”“赦宥”等制度都是“宽”对“猛”的补充与修正,旨在实现“法内求情”,以